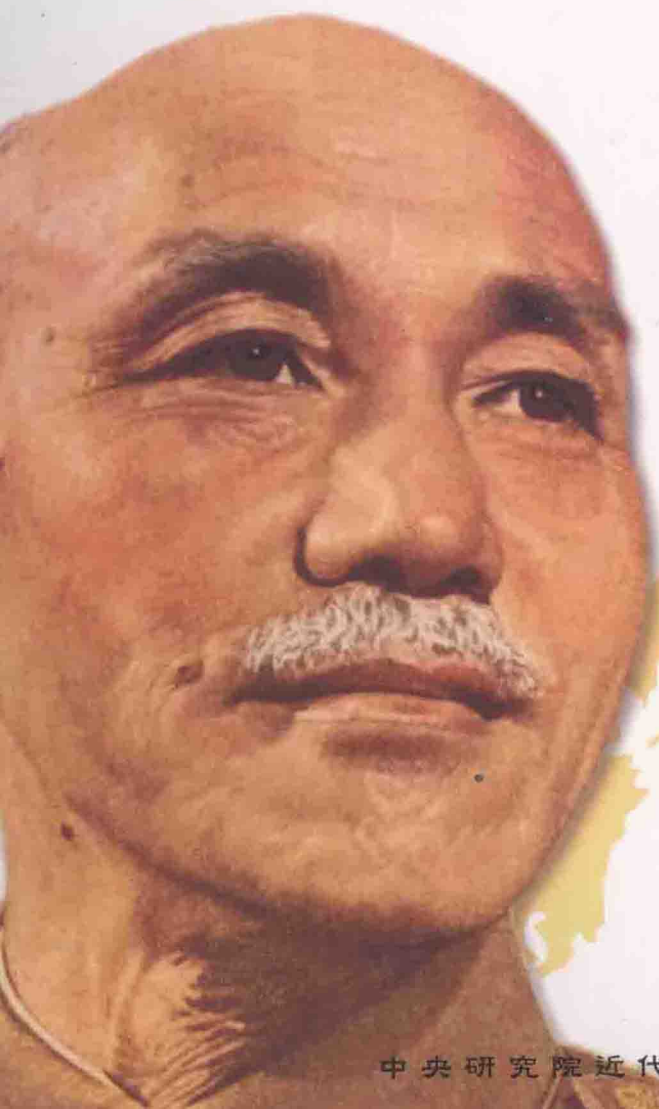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95）

蔣介石與日本

黃自進 著

——
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5）

蔣介石與日本：

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

黃 自 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 / 黃自進著。

-- 初版. -- 臺北市：中研院近代史所，民 101.12

面；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5)

ISBN 978-986-03-5679-3 (平裝)

1.蔣中正 2.中日關係 3.外交史

643.1

10102716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95)

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

著 者／黃自進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 話：(02)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戶 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印 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 69 號

電 話／(02)22989873

初 版／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定 價／新臺幣 4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03-5679-3

GPN 1010103692

自序

蔣介石在 20 世紀中國歷史脈絡裡的重要地位，眾所公認；如何理解和評價，卻也是爭議不已。隨著新時代的來臨，政治的忌諱不再，新史料的不斷出土，自是為研究者提供重新認識與評價蔣介石的絕佳機會。在個人專業的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領域裡，研究蔣介石，更是積蓄已久的志業。對我而言，蔣介石的魅力，來自於他在中日關係史上的代表性。中日兩國自 1873 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在現代國際法的規範下，兩國建立邦交，這一百餘年來，蔣介石可以說是最以兩國親善為念，並篤志勵行的政治人物之代表。如果能夠藉由研究蔣介石，為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野，為雙方史學界培養共識，讓民族間的和解，得以搭建起溝通的平台，尤其意義深遠。

此一構想，是我自 1980 年負笈東瀛鑽研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以來，最渴望能夠落實的課題。開始動筆，卻是在十二年之前，從醞釀至提筆，已歷二十年之久。主要的困難是自信不足。蔣早年留學日本，與日本淵源甚深，世所公曉。如何對這段史實進行評價，再三反覆思索，期可展現新意。尤其是蔣在 19 歲至 28 歲間的 9 年歲月裡，其中 6 年係在日本學習、工作、生活。日本是佔了蔣青春歲月近三分之二的異鄉，在他此後的人生軌跡裡，烙下什麼樣的影響？而此等經歷，對他往後日本觀的形成，以及對日政策的擬定，有何具體影響？相關歷史片段，雖無人否認其重要性，但內有國共兩黨史觀的爭鋒，外有中日兩個民族史觀的角力，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詮釋方向。

面對爭議不斷的蔣介石研究，倘欲超越既往的窠臼，尋索新史料自然是唯一的途徑。所幸，1998 年中正文教基金會成立，鼓勵國內史學界同好投身蔣介石研究。本所為此於 2000 年 4 月成立「蔣介石與日本」研究群，號召同仁共襄盛舉，齊力投入。個人也在該基金會支持下，2001 至 2004 年間，得以陸續編纂出版《蔣中正先生研究資料目錄（1980-2000）》、《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蔣中正先生的對日言論選集》等史料。透過與新史料的對話，也找到了為蔣介石研究投入新動力的門徑。

2002 至 2006 年間，〈蔣中正先生在日本學習的一段歲月〉、〈蔣中正先生與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責任的探討〉、〈滿州事變前後における國民政府の對日政策：蔣介石の思惑を中心に〉、〈蔣介石と滿州事變：「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の對日政策の原點〉、〈日本的侵華政策與蔣介石的對應：1932-1945〉、〈抗戰結束前後蔣介石的對日態度：「以德報怨」真相的探討〉、〈「安內攘外」的另一章：蔣介石對「日蘇先戰」的期盼〉、〈蔣介石の日本に対する『理解』『观察』『行動』〉等一連串論文的出版，就是建立在前揭新史料的解讀上，也都是個人為蔣介石研究找到承舊與創新起點的嘗試。這些論文，爾後也皆成為本書的骨幹，並分別改寫為本書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期許以融會貫通的面貌，貢獻給學界。

在書稿的撰寫過程中，能與眾多師長及國內外史學界同好切磋，獲取大量的資訊和建言，在在都是支持個人研究能夠漸進與深化的泉源。尤其是在 2004 年 11 月假中央研究院本所召開的「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國際會議，能與 9 位日本學者、10 位本所同仁，共集一堂，從教育、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不同角度，對

蔣與日本的關係作全面性探討。此一寶貴經驗，不僅為「蔣介石研究」的走向國際化，提供最初步的示範，更是我個人研究得以逐漸成形的重要關鍵。

這項群策群力，探討蔣與日本關係的新嘗試，也使所有參與者大概都有這樣的體會：蔣和日本的互動，並不是單一的面向。若欲深化對這一議題的理解，勢必得擴大層面，並與其它歷史議題相結合。特別是自 2003 年起，國史館不僅開放〈蔣中正總統檔案〉，並陸續出版檔案中最精華的《事略稿本》。而《蔣介石日記》也於 2006 年底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呈閱。現實與時代的禁忌既已被突破，更凸顯全面檢視蔣介石的時機已趨成熟。

為了掌握此一大量新史料出土所帶來蔣介石研究的新契機，本所首先解散已達成階段性任務的「蔣介石與日本」研究群，並於 2007 年 3 月另成立「蔣介石」研究群，準備與同時期在東京成立的日本蔣介石研究會攜手合作。在雙方擬定好合作計畫，向蔣經國基金會申請資助之際，意外地接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捎來的信息，認為三方合作，更名為東亞史學界培養共識。這項提案，因更能滿足諸方俊彥集智合力，深化「蔣介石研究」的共同意願。因此，在得到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持後，三方合作的三年合作計畫，於 2008 年 9 月正式展開；並分別於 2009 年 9 月、2010 年 9 月、2011 年 6 月，在台北、北京兩地舉辦過三次國際會議，合計提交了八十五篇的論文。

集結海峽兩岸、日本、韓國等地學者於一堂，切磋交流下的「蔣介石研究」，不僅對突破兩岸的意識型態、中日韓三國的傳統史觀窠臼，有莫大的助益以外，對我的蔣介石與日本之研究，也有眾多的啟發。

2008 年以後，〈北伐時期的蔣介石與日本：從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見〉、〈青年蔣中正的革命歷練（1906-1924）〉、〈蔣介石の人格形成と日本〉、〈蔣中正の訪日経験（1906-1927）〉、〈蔣介石の日本像〉等論文，以及《蔣介石と日本一友と敵のはざままで》專書的相繼出版，可為上述學術交流對個人的助益，提供見證。這些研究成果，在改寫以後，成為本書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的主體。藉由前揭章節的填補，本書輪廓得以成形。

在十二年的動筆過程中，近史所歷任所長呂芳上教授、陳永發教授、黃克武教授三位，都鼎力支持個人的研究事業，銘感在心。留學慶應義塾大學時代的恩師山田辰雄教授，在本書的醞釀階段，即已時常耳提面命，補充觀念。爾後山田教授籌組日本蔣介石研究會，全力支持本所所推動的蔣介石研究國際化。三十年來的教誨與師誼，皆隱伏在全書每一頁的字裡行間。

本書史料的蒐集範圍，除國史館、外交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等國內重要機構之外，還曾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南京第二檔案館、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日本外交史料館、日本國際文化研究中心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北海道大學圖書館等地。在蒐集史料的過程中，承蒙吳淑鳳教授、邵銘煌教授、郭岱君教授、林孝庭教授、經盛鴻教授、江正殷教授、劉建輝教授、伊藤信之教授、川島真教授、松甫正孝教授等人的熱心協助。他們對本書的完稿，有最直接的貢獻。而赴各地蒐集作業的經費，則有賴於國科會、日本交流協會、日本住友財團、以及美國史丹佛大學等國內外學術機構的奧援，謹此一併致謝。

為了確保能與日本學術界維持對話，本書一直是以中日文雙語

撰寫的方式進行。在撰寫日文稿的過程中，尤其感謝三十年來，永遠站在第一線替我修改語法、潤飾文字的平成國際大學淺野和生教授。此外，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戶部良一教授、小都晶子助教等人的協助，也曾發揮了救援作用。

本書的參考資料，有七成是日文。如何將日文史料轉換成簡明扼要的中文，一直是撰述過程中最難克服的難題。前輩同仁張秋雯教授、潘光哲教授皆曾先後代為潤筆。彼等之文采，是我學習的典範。

在漫長的撰寫過程中，除了碩博士論文指導教官中村勝範教授的啟蒙之恩，眾多師長及同仁的鼓勵與協助，更是支持我的研究能夠持續之動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楊天石教授、金以林教授，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玉井清教授，敬愛大學的家近亮子教授，日本大學的松重充浩教授，文化大學的陳鵬仁教授，政治大學的劉維開教授，以及本所前輩同仁張朋園教授、陳三井教授、黃福慶教授、陳慈玉教授、康豹教授等人，屢屢不吝的鼓勵與肯定，皆是我的重要支柱。特別是張玉法院士的鞭策與錯愛，更是鼓舞我勇往直前的熱能。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要衷心感謝本所出版小組召集人吳啟訥教授、負責電腦排版與精心製作圖表的林弘毅同學、反覆替我檢視全文的陳佑慎同學、以及對書稿細心校對的蔡文騰同學。

家姐惠清，比我年長 14 歲，是自律甚嚴的國中老師，也對我時有嚴厲之管教。在年少時期，她是我最不願接近的家庭成員。不過，家父遽然於 1972 年過世後，家姐一肩扛起家計，對我不再督責，只是默默地付出。我雖家貧，卻可無後顧之憂，更能享受青春，甚至赴日留學逐夢。家父的早逝，並未影響我的人生進程；家

姐的幕後支持，則可說是一股最關鍵的力量。2004 年家姐罹患肺癌，從病發到辭世，未及 3 個月。事出突然，哀痛不已，始驚覺家姐在我心中分量之重。惟因當時家母尚健在，傷痛之情，不敢形之於色，僅當午夜夢迴，暗中淚流。現今已過 8 年，悲痛緬懷之情，絲毫未減，謹以本書獻給家姐惠清（1942-2004），希望能表達對她的謝意於萬一。

黃自進序於南港

2012 年 11 月 29 日

黃自進

目 錄

自序	iii
前言	1
第一章 人格形成與日本：	
學習、認識、借助的三部曲	11
一、實際的生活體驗	12
（一）早年留學的歷程	12
（二）青年時期的磨練	31
（三）中年時期的交流	44
1. 蔣的人格特質與孫中山的肯定	44
2. 對日本的深厚情結	47
二、平日的觀測與期盼	51
（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51
（二）寄望中日世代友好	64
第二章 北伐時期的從友變敵	77
一、初期的相互觀測	77
二、中期的合作反共	88
三、末期的兵戎相見	106
第三章 九一八事變與「不抵抗政策」	125
一、事變前夕的中日情勢	126
（一）革命外交的成果	126

(二) 「統帥權干犯問題」與日本軍方的全面奪權	134
(三) 日本少壯軍人的整合與實踐革命	139
(四) 石原莞爾與關東軍的戰略部署	146
二、 「不抵抗政策」的由來	153
(一) 東北軍的失控與東北淪陷	157
(二) 國民政府的全面仰仗國聯	168
(三) 西南派與南京政府	177
三、 「四不」政策的實踐	183
第四章 華北危局與「安內攘外」	195
一、對「日蘇先戰」的期盼	195
二、華北治權機構的設廢	220
三、 「退卻戰略」的實踐	241
第五章 全面戰爭的對應	253
一、國內外的政治壓力	253
(一) 不得不戰	253
(二) 共產國際的壓力	262
二、日軍的戰略部署	270
(一) 軍事決戰期	273
(二) 政治主導期	274
(三) 封鎖邊境期	276
(四) 太平洋戰爭期	278
三、全面應戰的五部曲	281
(一) 政略與戰略的並用	281

(二) 上海出擊	293
(三) 華中防禦	303
(四) 以緩應急	310
(五) 苦撐待變	324
第六章 戰後布局與「以德報怨」	337
一、「以德報怨」的實質內涵	337
(一) 維持日本天皇制度	341
(二) 反對列強瓜分日本	346
(三) 善待日本在華軍民	351
(四) 反對報復性賠償	353
二、「以德報怨」的政策考量	359
(一) 盡釋前仇，以謀制蘇	359
(二) 戰後受降，聯日反共	371
結論	385
參考書目	403
附錄一：蔣介石年表	445
附錄二：年代對照表	457
索引	461

前 言

蔣介石的一生，實與中國近現代史密不可分，自是理解這段歷史不可迴避的議題。日本對近現代中國發展歷史的影響，亦是斑斑可跡。而在近現代中日關係史的脈絡裡，蔣介石正居核心位置，也是探討這段歷程不容忽視的一頁。因此，對於蔣介石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的熱門議題，相關研究層出疊見。然而，受限於史料，相關研究在 1980 年代以前不易開展。特別是在戰後冷戰體制政治環境的影響之下，對於蔣介石的評價與研究，總是褒貶互見，爭議頻出。目前中、英、日文學界關於蔣介石研究的成果，已有若干的回顧，¹大概輪廓或可歸納如下。

在蔣介石 1975 年逝世前後，就蔣涉及的相關史事進行翔實歷史學研究，仍屬不可能。不過，1930 年代以至 1970 年代間問世的資料與論著，對往後的研究，非無影響。汗牛充棟、流於溢美的官方宣傳姑置不論，1936 年毛思誠編纂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以及《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橫跨 1927 至 1949 年）、1978 年起秦孝儀總編纂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等，迄今猶受學界重視。當然無可諱言的是，前揭資料僅能代表官方立場，抑且在當時流通有限。但另一方面，與蔣不同立場的人士，早

¹ 參見艾愷（Guy Alitto）著，《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Chiang Kai-Shek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台北：谷風出版社，1993）；川島真，〈戰後日本における蔣介石研究〉，發表於「日本蔣介石研究会」（東京：慶應義塾大學，2008 年 8 月 6 日），12 頁。本稿係以同作者〈近年日本蔣介石研究的動向與成果〉，「回歸歷史的蔣介石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2008 年 4 月 13 日）為基礎。中文方面的回顧，散見於各篇論著。

已出以負面之評價，影響所及，實不容小覷。共產黨人陳伯達著於 1946 年的《中國四大家族》，對「蔣、宋、孔、陳家族」極盡醜詆，即其一例。² 而陳伯達於 1948 年完成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對中國大陸影響尤大；論者或謂，1980 年代以前，一般書著「在論點上幾乎照抄陳伯達，在資料上也無甚創新之處」。³ 又如英文世界中，早年問世的蔣傳資料，亦難稱嚴謹。⁴ 如伊羅生（Harold R. Isaacs）著於 1938 年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⁵ 將蔣介石描繪為惡棍，對西方學界於蔣介石形象之影響是不可否認的。⁶ 這類負面評價，隨著 1949 年國民黨政權失去中國大陸而強化；即使是歐美日學界，1980 年代以前，中國近代史研究往往圍繞在以共產黨為中心的革命史觀，針對蔣介石的敘述，也是聚焦於蔣「何以失去中國」。⁷

前揭的蔣介石負面評價，強調蔣個人性格的缺點，對維繫強大中央政府的無力，對群眾運動與農民問題的漠視，以及在內戰中失

² 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出版地不詳：長江書店，1946）。

³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北京：人民書店，1954）。另見陳紅民、何揚鳴，〈蔣介石研究：六十年學術史的梳理與前瞻〉，《學術月刊》，43：5（2011 年 5 月），頁 148。

⁴ 例見 M. A. Linebarger,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 A Political Study*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3); Emily Hahn, *Chiang Kai-shek: An Unauthorized 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5); Robert Payn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Weybright and Talley, 1969)。相關傳記資料回顧，參閱呂芳上，〈導讀：重評蔣介石〉，收入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10）。

⁵ 目前學界普遍所見的是 1951 年再版。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 Press, 1951)。

⁶ 艾愷（Guy Alitto）著，《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頁 64-68。

⁷ 家近亮子，〈前言〉，收入家近亮子，《蔣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東京：慶應義塾大学，2002）。

誤的原因。這種譏評延續到蔣氏逝世以後。例如，Brian Crozier 的《失去中國的人》（*The Man Who Lost China: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 1977 年出版），⁸ 對蔣充斥機械性的評價，一看標題便可掌握內容。中國大陸 1980 年代榮孟源著《蔣家王朝》，⁹ 充塞中共官方見解；1989 年楊樹標《蔣介石傳》，¹⁰ 依不同時期貼上「肯定」、「否定」的標籤，政治判決十分清楚。誠然，在 1980 年代晚期以後，中國大陸的蔣介石研究日漸趨於學術化發展，減少了官方宣傳的色彩，1996 年由張憲文、方慶秋主編的《蔣介石全傳》可為代表性書著。¹¹ 即令如此，後者的立論仍尊奉共產革命史觀的基調，而且也無從運用蔣介石的個人史料，缺陷勢所難免。¹²

與此相較，臺灣的蔣介石研究，由於背負「偉人」形象的包袱，也難稱公允客觀。1960 年代臺灣再版董顯光《蔣總統傳》，¹³ 可謂欽定官書；1970 年代由官方提供資料，日本記者撰述出版的《蔣總統秘錄》，¹⁴ 篇幅浩繁，蔣氏這個「人」卻似乎一直沒有在書中出現。而蔣逝世後臺灣首見的蔣傳，當推黎東方的《蔣公介石序傳》，基本上不出以歌功頌德的筆法，略顯粗糙。及至 1995 年，汪榮祖、李敖合作出版的《蔣介石評傳》，則頗有一舉推翻臺灣的

⁸ Brian 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Scribner, 1976).

⁹ 榮孟源，《蔣家王朝》（北京：青年出版社，1980）。

¹⁰ 楊樹標，《蔣介石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

¹¹ 張憲文、方慶秋主編，《蔣介石全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¹² 陳紅民、何揚鳴，〈蔣介石研究：六十年學術史的梳理與前瞻〉，頁 153。

¹³ 董顯光，《蔣總統傳》（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¹⁴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台北：中央日報社，1974-1976，全 15 冊）。

蔣氏偉人形象之企圖，炮火全開，批判意味十足。¹⁵ 惟無可諱言的是，蔣介石研究的真正開展，仍待主客觀環境的進一步變化。¹⁶

1980年代的世界出現可觀變化。臺灣政治逐漸民主化，歷史學研究的禁區逐漸消弭。而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共產革命史觀的影響也益形遜色。於是，中、英、日等文字的蔣介石研究，紛紛湧現，並突破既往窠臼，晚近仍有方興未艾之勢。史料的逐步開放，即為蔣介石研究得以嶄露新象的重要動力來源。原藏陽明書屋的「大溪檔案」，於1995年轉移至台北國史館，並於1997年正式開放使用，今定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對近現代史研究的作用與意義，難以估量。在各種蔣介石核心史料中，以蔣介石日記最受矚目，但在1990年代仍未開放。1994年黃仁宇所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¹⁷ 是第一本以蔣日記為題的專著；惟黃未得見日記原稿，僅運用了《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蔣總統秘錄》上引錄的部分，留下不少缺憾。又如1970年代旅美學學者陸培湧撰《早年蔣介石：其人格與政治的研究》（*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因無從運用蔣日記等史料，逕援引行為科學理論，探析蔣介石青年階段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與整合危機（integrity crisis）；¹⁸ 倘若能得見晚近新開放的資料，其研究成果勢必更有說

¹⁵ 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台北：聯經出版，1976）；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台北：商周文化，1995）。

¹⁶ 前揭論評，俱多參見呂芳上，〈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收入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頁86-87；呂芳上，〈導讀：重評蔣介石〉，頁2-3。

¹⁷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4）。

¹⁸ Pichon P. Y. Loh, *The Early Chiang Kai-shek: A Study of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1887-192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服力。2006年起，蔣介石日記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開放，瞬即吸引學界與公眾的目光，當非無因。總此而言，史料的開放，以及政治束縛的解除，都是近年來蔣介石研究風潮的重要條件。

蔣介石日記之公諸於世，雖然沒有造成近代中國史事認識上的顛覆性衝擊，但學界藉此新史料的運用，仍舊產出了數量可觀，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以蔣介石為主題的專著中，例如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使用了蔣日記等材料，一反過去中國大陸學者對蔣的公式定論，對蔣氏在抗日戰爭上的表現賦予正面評價。¹⁹ 陶涵（Jay Taylor）所作蔣傳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亦為一例，該書一反過去歐美學界以成敗論英雄的見解，認為一味指責蔣在二次大戰期間的緬甸戰役以及國共內戰的失利，並不公允，反而強調美國支援的不利應該更多檢討，皆是近期較受矚目的專著。²⁰ 在此同時，各地學界也出版了若干以蔣介石為題的專著，單篇論文更是不勝枚舉。²¹

¹⁹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²⁰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譯本在內容上有若干修訂。

²¹ 晚近運用蔣介石日記等史料的學術論著甚多，以蔣介石為題的專書、或集結成論文集者，或可舉隅如下。黃自進主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台北：稻鄉出版社，2006）；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陳紅民、趙興勝、韓文寧著，《蔣介石的後半生》（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王奇生等著，《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2011）；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黃克武主編，《遷台初期的蔣中正》（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出版中）；汪朝